

传播学视角下容闳与近代“西学东渐”

周斑斑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容闳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也是近代“西学东渐”的推动者。容闳的“西学东渐”事业曲折坎坷,屡受挫折,但容闳希望通过“西学东渐”富强中国的信念却一直没有动摇,容闳“西学东渐”的努力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其本人在近代“西学东渐”中的地位也得到了后人的认可。

[关键词]西学东渐;受传者;传播者;传播效果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083(2015)06-0105-05

容闳(1828-1912),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早年在美国耶鲁大学求学期间就把从事“西学东渐”事业、实现中国文明富强的社会理想作为其一生追求的目标,事实证明,容闳一生都在践行着这个伟大的目标。

1 “西学东渐”的受传者

19世纪初,清政府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禁止西人在华传教,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士只能在南洋及澳门一带传教,“传教士们在马六甲、新加坡、巴达维亚等地,开学校、办印刷所,出版书籍报刊,在当地华侨中传播西学”。^[1]当时属于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门是传教士们最早在中国办学的地方,容闳的家乡位于澳门附近的南屏镇(今属珠海市),由于地理上的便利,1835年,七岁的容闳被父母托人送进澳门当地的一所教会学校就读,该教会学校就是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夫人于1834年设立的女子教会学校,同时也兼收男学生,是之后成立的马礼逊学校的预备学校。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西学的先进性还没有引起国人的重视,学习西方并不被社会主流所认可,即使在澳门这样开风气之先的地

方,有社会地位的人家也是不愿意把子弟送到教会学校读书的,科举取仕才是当时的正途。“惟是时中国为纯粹之旧世界,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2]容闳作为贫寒人家的子弟,想走仕途之路是很困难的,再加之当时教会学校为了招收学生,向学生及其家庭提供优惠补贴,而且从教会学校出来懂点洋文也能便于以后谋生,这些对贫寒人家的子弟很有吸引力。“意者通商之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吾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乎”,^[3]这也是容闳进入教会学校的主要原因。1841年,容闳正式进入马礼逊学校。马礼逊是伦敦会传教士派出的第一位来华传教士,是晚清早期“西学东渐”的开拓者,其后的传教士们为了纪念其一生的事迹于1839年设立了马礼逊学校。容闳在马礼逊学校度过了小学时代,1846年冬,该校校务主持者勃朗先生返美,归国前愿携几名学生赴美,得此机遇,容闳于1847年1月,同其他两名同学乘坐“亨特利思”号帆船一起赴美留学。容闳抵美后先在孟松学校读了两年预备,后于1850年进入耶鲁大学,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

容闳由贫寒人家的子弟一跃成为“中国

收稿日期:2015-10-15

作者简介:周斑斑(1991—),女,安徽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和晚清政治制度史。

毕业于美国最高学府的第一人”，其中除了个人的勤奋努力，更是近代“西学东渐”的结果。传教士来华传教，开办学校，传播西学，拉开了近代“西学东渐”的帷幕，容闳才有机会接触西学，才会有后来留学美国的机会。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这一时期的容闳是西学的受传者，作为西学受传者的容闳，从1835年进入教会学校到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除了中间短暂的间断，在几乎长达20年的时间里，容闳完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一套系统的西式教育。在西学的长期熏陶下，容闳已经逐渐“西化”。这是容闳当初留学所没有料想到的。容闳在美八年，归国后，却不能作中国语，“予久居美洲，于本国语言，几尽忘之”“予自念以中国人不能作中国语，亦无词以自解也。”^[4]后来他不得不花半年时间向一个美国传教士补习汉文。容闳的“西化”不仅体现在语言方面等浅层次的地方，更深层次的“西化”是其精神层面的“西化”，西方的自由、民主、天赋人权的观念已经深深影响了容闳。容闳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相对于传统守旧的儒家文化，先进的西方现代文化对容闳更有吸引力。长期的西学熏陶的确在容闳身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但是作为西学的受传者，容闳绝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西学，并没有被西学同化，没有完全按照传播者的意图去行动，而是有自己的自主选择性。

在传播活动过程中，传播者虽然占主导地位，但并不意味着作用对象即受传者是一种完全被动的存在。“在任何类型的传播活动中，受众都不完全是消极被动的‘受体’，他们在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干预传播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影响传播活动的过程、决定传播活动的效果。”^[5]传播活动中受传者的自主性，在容闳留美期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容闳入耶鲁大学之前，经济问题没有解决，其所就读的孟松学校愿意为其提供资助，但条件是容闳必须保证大学毕业后以传教士为职业，容闳不加思索、坚决拒绝了为他安排的这种命运。虽然容闳接受了多年的西学，西学的长期影响和熏陶却没有让容闳丢失自己的爱国心，在美留学期间，西方的

文明强盛与中国的落后软弱形成强烈对比，深深刺激了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容闳有一段感人至深的对白“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6]这是容闳“西学东渐”富强中国内心思想的真实流露，可以说在容闳于美国耶鲁大学求学期间他的“西学东渐”富强中国的理想就已经成形了，回到中国之后，亲身看到中国落后腐朽的现状，更加坚定了他传播西学挽救中国的决心。相较于同时期的林则徐、郑观应，以及后来的曾国藩、李鸿章等国内对西学有所了解的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容闳的西学知识更纯正、更广泛、更超前。容闳一生跨越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是晚清覆亡和民国创建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是近代“西学东渐”的助推者。正是早年接受西学的经历加上强烈爱国心的驱使，容闳最终走上“西学东渐”的近代西学传播之路。

2 “西学东渐”的传播者

从1854年回国到1902年返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容闳始终以一个西学传播者的身份，顺应“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积极投身西学传播事业，历经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容闳始终没有放弃传播西学、富强中国的人生目标，但是在传播西学的过程中，由于传播环境的变化，传播对象的不同，以及其他影响传播活动的因素，容闳的西学传播呈现出阶段性和曲折性。“传播既是一个过程，更是一个系统，传播活动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各个部分构成并执行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这个系统的运行不仅受到它的内部结构的制约，而且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与环境保持着互动的关系。”^[7]

容闳的西学传播呈现出阶段性，而这种阶段性是与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进程相吻合的。回国之初，容闳并没有立刻得到统治阶级的重用，为了谋生，他辗转多种工作。容闳清楚，要想实现“西学东渐”的良好传播效果，在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

下,必须走上层路线,结交当权者,利用他们的势力打通传播西学的通道,实现西学救国的目的。容闳一直都在等待结识权贵的机会,1856年,容闳在派克处任书记时就坦露了这种心态:“予乐就之意,本意不在金钱,欲借派克力识中国达官,庶几得行予志”。^[8]容闳回国之初,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之时,1855年容闳在广州目击了两广总督叶名琛残酷镇压当地的太平天国运动,对太平天国运动产生同情之感,加之容闳回国已久,却始终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重用,他甚至萌生了寄希望于太平天国的想法。1860年,容闳和两个美国传教士一同赴南京对太平天国进行考察。在南京见到洪仁玕后容闳向其提出了七条建议:“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定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容闳将其传播的西学具体化,以建设现代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的方针大计的形式呈现给洪仁玕,但是容闳的建议却没有被太平天国采纳,最终遗憾离开。此次对太平天国的深入考察也让容闳发出“以予观察所及,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的感叹。南京太平天国之考察,让容闳认识到太平天国不是其可以依附的传播对象,于是容闳把目标投向了洋务派。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的困扰,为了巩固自身统治,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开明地主阶级兴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办洋务需要精通洋务的人才,留学美国的容闳引起了曾国藩的注意,而容闳也一直在努力寻找机会结识达官贵人,二者一拍即合,容闳终于找到了理想的传播对象。容闳在传播西学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受传者的实际需要,根据具体的传播环境,适时地提出相应的传播内容。在跟曾国藩的前两次会面中,容闳得知曾国藩有建立机器厂之意,所以没有立即提出派遣幼童留美的计划,而是根据曾国藩的需求提出建立机器厂的建议。容闳根据受传者的实际需

要,对传播内容加以调整 and 改变。容闳的这一做法收到了成效,1863年容闳受曾国藩委托赴美采购机器,1865年顺利完成任务回国。容闳赴美购买机器的成功给曾国藩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为后来幼童赴美留学计划得到曾的支持提供了铺垫。

从1868年到1870年,容闳的幼童留美计划一直未能成行,直至1870年春,天津教案的发生为容闳酝酿已久的教育计划的实施提供了契机。在曾国藩等四位大臣的联名上奏下,1870年清政府批准了幼童赴美留学计划。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官费留学生,远渡重洋,前往美国。120名幼童分四批分别赴美,留学年限是15年,赴美之前先在国内预备学校学习一段时间。1872年,容闳以留学生副监督的身份携第一批三十名幼童赴美。

留美幼童抵美前,“久处专制压力之下,习于服从性质,故绝无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思想”,^[10]幼童抵美后,由于“日受新英国教育之陶熔,且习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其故态”。^[9]幼童长期受美国自由、民主思想和风尚习俗、宗教信仰的熏陶,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以陈兰彬、吴子登为代表的顽固派所不能容忍的,接替陈兰彬担任留学生监督的吴子登想方设法破坏留学事业,并上书朝廷:“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他还建议朝廷“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并且认为“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11]1881年,120名留美幼童中除少数特殊情况外,其余94名幼童被全部撤回中国。被撤回的留美幼童有不少后来取得了很大成就。其中就有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荃,清末外务大臣梁敦彦,清华学校首任校长唐国安,参加过甲午海战,民国初年担任海军高级将领的蔡廷干等。这些留美幼童在推动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和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当

然这里面离不开容闳的努力。

幼童留美事业的破产并没有使容闳放弃西学传播,随着甲午战争清政府惨败,洋务运动的破产,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维新运动,要求改变君主专制体制,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君主立宪体制。容闳在美国留学多年,对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推崇的,回国后,容闳切身感受到了清政府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落后与腐朽,他深刻认识到将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国内传播,改变中国落后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实现“西学东渐”富强中国的重要途径。

当时国内的传播环境,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逐渐形成一股潮流,改良派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容闳积极提出顺应时代潮流的传播内容。容闳与维新派来往密切,支持维新派变革政治制度的要求和主张,以至于容闳在北京的寓所“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12]戊戌政变后,容闳也因此受到牵连,被清政府通缉。

1902年,由于国内环境的不利,容闳再次返美,但是身在美国的容闳依然没有放弃传播西学的信念,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革命思潮风起云涌,民主思想逐步深入人心,容闳再一次改变了传播内容,尤其是看到康梁领导的保皇派的保守和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进步,容闳最终放弃了之前宣传的改良路线,改走革命路线,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主张推翻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

3 “西学东渐”的传播效果

对传播效果的考察,分为两个层面。微观层面是指传播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传播者的意图或目的,宏观层面是指传播者的传播活动对受传者和社会所产生的一切影响和结果的总体,不管这些影响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显在的还是潜在的。

传播西学,将西方现代文明传播于中国,使中国变成西方国家那样的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国的富强是容闳的人生理想,也是容闳传播西学的目的。容闳一直都在探索如何将最先进的西学传播到中国,从最初传

播西方先进的技术,到传播西方先进的教育,再到传播西方先进的制度,容闳在传播西学的过程中,由于需要借助不同受传者的势力,就要根据受传者的需求适时地调整传播内容,所以在容闳传播西学的过程中,其传播内容是变化的,这是由具体的传播环境和传播对象以及作为传播者的容闳自身认识的变化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但是最终都是为了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实现传播目的。

从传播效果的微观层面来看,容闳西学传播的效果是不理想的,容闳一直心系的幼童留美事业最终夭折,其最终落得被清政府通缉的下场,无论是洋务派还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没有立刻助其实现富强中国的目的,其所走的上层路线最终也是收效甚微。但是从传播效果的宏观层面来看,容闳的西学传播的确是影响深远的,其在传播西学的过程中,无论是江南机器制造局的建立,兵工学校的创立还是幼童留美计划的实施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尤其是其主持的幼童留美事业开创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先河。在近代“西学东渐”和西学传播史上,容闳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在“西学东渐”和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后人铭记。

参考文献:

- [1]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容闳.西学东渐记[M].徐凤石,恽铁樵等译,钟叔河导读、标点.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11.
[3]同上,分别见于第2,27,22,30,90,90,91,107.
[4]段京肃.大众传播学:媒介与人和社会的关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5]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Rong Hong's the Eastward Spread of Western Cultures in Modern Times in the Context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Zhou Banban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Abstract: Rong Hong was an outcome product and an impeller of the Eastward Spread of Western Cultures, during which period his career came across constant difficulties and frustrations. However, his firm belief of using Western Cultures to make China prosperous and powerful has never been disturbed, his efforts have facilitate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therefore, his status has been recognized by later generations.

Keywords: Eastward Spread of Western Cultures; receiver; puplicist; paplicity effect

(上接第98页)

An Exploration of Language Features on Lu Yu's The Classic of Tea

Zhuang Shuangt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0)

Abstract: The Classic of Tea is the first integrated tea encyclopedia which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ically summarized the tea procluction and tea affairs events during and before Tang Dynasty, and it is by far the oldest and most complete monograph on Tea . Based on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Lu Yu and his work The Classic of Tea, this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the language and artistic features of this book.

Keywords: Lu Yu; The Classic of Tea; language arts